

CONFRONTATION
OF THE CENTURY

世纪博弈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美金融关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Sino-U.S. Financial Relations

陈平◎著

本书试图通过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类型、生成路径、操作机理和应对策略

时事出版社

CONFRONTATION
OF THE CENTURY

世纪博弈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美金融关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Sino-U.S. Financial Relations

陈平◎著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博弈：国际货币权力与中美金融关系/陈平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195-0164-8

I. ①世… II. ①陈… III. ①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②中美关系—对外金融关系—研究 IV. ①F821.1②F832.6
③F83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7289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5 字数：24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争议“货币战争”	(2)
二、现实与理论背景	(5)
三、三大研究任务	(13)
四、本书的内容结构	(15)
第二章 审视国际货币：三个维度	(18)
一、国际货币的属性	(18)
二、国际货币的功能	(23)
三、国际货币的层级	(34)
第三章 国际货币权力与美元霸权	(39)
一、权力的形态与层次	(39)
二、国际货币权力	(45)
三、美元霸权的识别与界定	(49)
第四章 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权力的生成	(69)
一、新综合现实主义	(69)
二、货币权力生成的经济条件	(75)
三、货币权力生成的政治基础	(87)
四、美元霸权之谜	(96)
第五章 国际货币对抗：霸权国策略	(100)
一、货币对抗的三个层次	(100)
二、货币对抗的目标与对手	(102)

三、货币对抗：霸权国策略	(104)
第六章 国际货币对抗：目标国策略	(121)
一、避让	(121)
二、转嫁	(123)
三、遏止	(124)
四、对抗	(128)
第七章 大国间的货币金融对抗	(133)
一、美国对日本的货币掠夺与破坏（1983—1991）	(133)
二、美国对俄罗斯的货币金融破坏（2014—2016）	(151)
三、理解货币“帝国”	(156)
第八章 21 世纪以来的中美货币对抗	(161)
一、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	(161)
二、不可避免的中美货币对抗	(164)
三、对华货币打击的条件与准备	(168)
四、阿喀琉斯之踵	(176)
五、不宣而战	(179)
六、汇率“闯关”	(184)
七、惨重的代价	(195)
第九章 世纪博弈的中国战略	(199)
一、中国战略被动的根源	(199)
二、特朗普当选与美国对华货币对抗的前景	(205)
三、中国的分阶段应对策略	(213)
参考文献	(226)

第一章 导 论*

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21 世纪究竟是延续美国霸权还是进入中国世纪，一直为国际关系学界所热议。自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一概念以来，作为新兴大国与当代霸权国，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权力争夺而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不时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有乐观的学者相信，在核子时代，基于最基本的人类理性，中美两国在 21 世纪很难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不会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在战场上展开殊死争夺。不过，绝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还是认为，即使中国不主动挑战美国利益，两国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两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某种程度的对抗恐怕也难以避免。这是由霸权惯性，特别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

本书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货币权力与中美货币金融关系。尽管学术界对“货币战争”这一概念存在不同观点，但与贸易对抗一样，国家间货币金融博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本书的基本判断是，中美两国已经处于货币金融对抗之中，这种对抗的概率还要持续较长时间，甚至成为决定两国 21 世纪国际地位转换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本书将就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例如货币权力的概念、性质，货币权力的生成与操作机理，美国是否以及如何利用美元霸权对他国实施货币金融打击，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可能的货币金融打击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应对美元霸权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0YJAGJW002）的最终成果，相关研究亦得到大连海事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3132016361）的支持。

一、争议“货币战争”

在过去几年中，货币战争是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以来，以货币战争、金融战争、美元霸权等为题材的中文图书，仅仅国内出版的数量就超过数十种。特别是随着近年中美战略对抗的升级，各种唱空、做空中国的声音不时从西方传出，有关中美间货币金融博弈的研究、讨论日趋增多。大家在对中美货币金融关系给予极大关注的同时，围绕“货币战争”这一主题，在学术界、金融界和民间等不同层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 强烈认同。部分学者、市场从业者以及媒体作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代表人物包括带有激进色彩的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赫德森（Michael Hudson），华裔学者廖子光，日本学者吉川元忠，以及国内研究者宋鸿兵、丁一凡、雷思海、张庭宾等。其中，尤以宋鸿兵的5卷本《货币战争》和威廉·恩道尔的《金融海啸》产生的影响最大。这些作者认为，历史上西方大国内部以及大国之间围绕货币权力曾经展开长期、激烈的争夺。美元在二战后最终击败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摆脱黄金和固定汇率束缚，成为真正的国际霸权货币。他们相信，被操纵的美元体系是一种经济武器；美国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货币霸权，为获取经济利益或实现政治目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操作和运用货币权力。在他们看来，所谓货币战争，既是国家间为争夺国际货币发行权而展开的对抗，也可以表现为关键货币国针对特定国家实施的货币金融攻击。

2. 断然否定。对“货币战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以金融市场精英人士为主，也包括一些在海外大学、研究机构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的华裔学者，代表人物主要有胡祖六、陈志武、王健等人。这些人普遍认为不存在国家间的货币战争，特别反对把众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归因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的“阴谋论”观点。在针对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个早期版本的批评文章中，时任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指斥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谬误甚多，有些内容则

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强调指控国际银行家制造金融危机的说法“离奇荒谬、有违常识”。^①另一位在美联储从事研究工作的华裔学者王健，也对少数政治精英或金融精英控制中央银行的观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②

3. 客观中立。与华裔金融精英条件反射式的否认货币战争的存在不同，学术界和部分市场人士对货币权力和货币战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他们不认同神秘团体操纵一切的阴谋论观点，但也不否认货币权力和国家间货币对抗的现实存在。

关于货币权力，西方主流学术界不仅承认货币权力，对于货币权力的研究也已经非常深入。^③在其经典著作《美元悖论》中，弗雷德·伯格滕（Fred Bergsten）在基本概念上区分了强弱两种权力——积极权力和消极权力（Bergsten, 1975），并研究了两种权力的不同作用机制和来源。之后本杰明·科恩（Cohen, 1977）和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 1988），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货币权力，研究了货币权力的性质、类型、来源等基本理论问题。进入 21 世纪后，大卫·安德鲁斯（Andrews, 2006）、科恩（Cohen, 2013、2015）又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将研究不同货币权力形态和决定，基本奠定了国际货币权力

① 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财经》2007年第25期。

② 王健：《还原真实的美联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西方关于货币权力研究的主要文献包括：Charles P.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Fred Bergsten, *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Benjamin J. Cohen, *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inter Publishers, 1988; 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dam Harnes, “Hedge Fund As a Weapon of State?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wer in an Era of Liberalized Finance”, YCISS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57, 1999; C. Randall Henning, “The Exchange Rate Weapon, Macroeconomic Conflict and Shifting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EUI RSCAS Working Paper No. 11, 2005; David M. Andrews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Kirshner, “Dollar Primacy and American Power: What's at stak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5: 3;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enjamin J. Cohen, *The Future of Global Currency: The Euro versus the Dollar*, Rutledge Publishers, 2011; Benjamin J. Cohen, *Currency and State Power*, in Martha Finnemore and Judith Goldstein eds, *State Power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界并不讳言货币地位的影响与大国对货币权力的追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1970）最早讨论了货币地位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伯格斯特（Bergsten, 1975）不仅最早明确分析了美元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同时指出货币权力可以使一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或者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① 几乎所有当代货币权力研究者都认为，货币、金融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大国追求货币权力，一方面因为货币权力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权利、利益以及更多的宏观政策自主性；另一方面，通过货币权力的运用，还可以对他国实施强制，实现本国经济乃至政治和外交目标。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之一，国际货币权力与一国政治与军事权力互为支撑。货币国际地位和货币权力的强弱，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稳定，也影响甚至决定一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乃至兴衰成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开始将货币权力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货币权力操作。乔纳森·柯什内尔（Jonathan Kirshner）的《货币与强制》（Kirshner, 1995）系统研究了货币权力操作的基本模式、策略和路径，是从学术角度系统、深入研究货币战争机理的第一部著作。东亚金融危机后，对冲基金（Harmes, 1999）、汇率（Henning, 2005）作为美国货币战争的工具和“武器”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斯泰尔（Steil & Litan, 2006）则分析了基于美元权力的美国金融权术的操作机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前处长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其《美元陷阱》（The Dollar Trap）一书中坦率地承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享有通过债务货币化，“将主权债务违约成本转嫁外国投资者的特权”。^② 这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某种形式货币战争的存在。

在中国国内，货币权力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过去的十几年中，有大量论文涉及“美元霸权”问题。研究的内容涉及美元霸权的来源、收益、可持续性（李海燕，2003；何帆、张明，2005；鲁世巍，2006；

^① Bergsten, C. Fred, *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 Press, 1975, p. 4.

^② 参见该书的中译本：[美]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刘寅龙译：《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新世界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9 页。

李向阳, 2005; 程恩富, 2007; 王湘穗, 2009; 陈平、管清友, 2011)、对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黄河, 2008; 尹应凯, 2009; 王湘穗, 2011; 潘英丽, 2012; 陈平、何帆, 2012)、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等问题。在美国持续施压人民币升值之后, 国内学者对美元霸权操作机理、应对策略的研究也逐步展开, 并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张斌、何帆, 2004; 丁志杰, 2010、2014; 华民, 2010; 姚大庆, 2010; 陈平、赵昌平, 2016)。总体上看, 中国主流学者虽然鲜有以“货币战争”为题发表研究成果, 但大量与“美元霸权”相关文章的发表, 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大国货币金融对抗、博弈的历史客观性和现实可能性。

二、现实与理论背景

本书以货币权力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历史和理论的分析, 揭示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类型、生成机制和操作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 针对当前中美货币金融博弈, 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这样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

(一) 中美紧张关系和中美货币金融博弈的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日益加深。自2011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 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在中国周边展开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 刻意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 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美元持续走强, 各种“唱空”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 已经实际上揭开了对华货币金融打击的序幕。^①

^①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 在2016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公认的货币金融战前台操盘手索罗斯公开唱空中国, 称“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随后, 多家美资对冲基金开始在全球大肆做空人民币。

客观而言，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但美元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货币。美元的霸权表现在：第一，在全世界所有货币中，只有美元拥有完全意义上的全部三大功能，也只有美元拥有全部三大货币权力，而瑞郎、日元、欧元要么几乎没有货币权力，要么只在部分层面具有非常有限的货币权力，远不能与掌控支付清算权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美元相提并论。第二，鉴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美国操作美元权力几乎不受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摆脱黄金“紧身衣”和固定汇率的束缚，使得美国有能力根据需要操纵汇率、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针对特定国家实施战略性货币金融打击。

自美元登上全球舞台以来，美国对货币权力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始终有着清晰的认知。货币权力作为美国金融权术（financial statecraft）的核心工具之一，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① 当前，对于极力阻挠中国走向复兴的美国而言，虽然不会放弃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在一些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学者看来，与其与中国展开代价巨大而没有十足获胜把握的军事对抗，不如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经济。只有削弱中国将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实力的能力，才是美国对抗中国“最后的王牌”。^② 而要扼杀中国经济，具有巨大杀伤力而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的货币金融打击，是美国绝不可能放弃的优先选择。

作为美元体系中的一员，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巨大依赖，这使中国在面对美元权力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国、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大宗商品进口广泛采用美元计价结算；中国还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美元权力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另外，中国超过40%的外贸依存度和超过60%的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

^① 参见 Ben Steil and Robert E. Litan, *Financial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9。

^② 参见 Peter Navarro, “Strangle China’s Economy: America’s Ultimate Trump Car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 2016。

约60%的美元储备和美元结算占比，意味着中国相对美元权力的巨大脆弱性。^①虽然中国政府长期奉行稳健财政政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受到美元融资权的重大影响。但随着中国资本项目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未来美元权力可能会在融资、支付清算、交易计价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直接、巨大的威胁，中国对此不能不提前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二）反阴谋论与货币战争研究的污名化

近年来，由于一些反阴谋论者的话语权及其背后支持者的强大背景，对于货币战争问题的批评有扩大化、污名化的倾向。有关大国货币战争或关于货币权力的分析研究，很容易被扣上“阴谋论”的帽子。这并不难以理解——货币战争或货币对抗目前还缺少公认的概念界定和权威的理论研究；多数货币对抗研究都不是基于第一手的资料，各国政府也几乎从未公开过本国对他国发动货币战争的档案材料。权威史料的不足，使得货币战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难度最大、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更令人尴尬的是，由于高度的政治属性，货币战争作为国家间激烈对抗的一种形式并未得到相关国家官方的公开证实，很难在正统学术界得到广泛认知和承认。一旦某位学者从事货币战争研究，很容易被扣上“阴谋论”的帽子，不仅遭受学术声誉上的损失，还会被排除在主流学术团体之外。货币战争与货币权力研究遭遇的这种尴尬，既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凸显出游走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边缘的货币权力研究，一旦触碰到既得利益，其可能遭遇巨大的阻力和反弹。

我们并不认同阴谋论，也不会为任何形式的阴谋论辩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认为各种重大政治、社会或经济事件都完全由一个神秘、庞大集团或组织阴谋策划，这种认识本身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现实证据。一些民间研究者关于货币战争的研究，的确也存在论述逻辑上的缺陷和史

^① 相关数据截至2014年底，数据分别取自中国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料上的不足甚至失实。反阴谋论者对这类著作的批评，并非全无合理之处。然而，这并不能反证反阴谋论者的天然正确。相反，胡祖六等人的一些文章，在批评阴谋论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及对部分历史事实的遮蔽和扭曲。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即使反阴谋论者能够证明国际银行家没有为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策划阴谋，他们也无法否定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更无法否定美国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大国之间争夺货币发行权的事实。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争夺货币发行权，两次设立中央银行未能成功。20世纪20年代之后，英国和美国围绕国际货币发行权展开持续40年之久的激烈争夺。欧元诞生以来，欧元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影响，也曾经一度让美国金融界和学术界忧心忡忡。

反阴谋论者的另一个逻辑缺陷，是他们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金融市场不会被私人机构或关键货币国所操纵。最近几年曝光的事实表明，包括外汇、黄金、石油在内，几乎所有主要金融衍生品都被高盛、摩根大通、花旗、巴克莱等美欧金融机构操纵，而这些操纵几乎都是建立在美联储操控联邦基金利率这一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当这些国际投行在监管机构眼皮底下疯狂投机，最终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胡祖六关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

反阴谋论者的第三个逻辑缺陷，是他们无法证明关键货币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与私人机构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反阴谋论者不得不承认，从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而言，中央银行理应是公共机构而非私有。几乎所有反阴谋论者都极力强调，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不是纯粹的私人机构。然而，即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政府机构，也无法否认地方储备银行的私人机构性质，无法否认美国货币政策最高决策机构中有约半数投票权明确掌握在代表私人金融机构的地方储备银行主席手中。当美联储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以及财政部、美联储与华尔街投行之间种种难以言说的暧昧关系曝光之后，反阴谋论者所谓金融精英无法控制中央银行的观点就显得十分脆弱。当美联储不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执意执行有利于本国而可能导致其他地区宏观经济动荡的货币政策的时候，所谓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与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仅仅是“巧合”，^①美国无法通过美元的地位和美联储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为银行家谋私利，无法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观点，就更像是一种诡辩。

本书无意把反“反阴谋论”作为研究的主题。但反阴谋论者上述的逻辑缺陷表明，在对民间货币战争研究进行客观评价的同时，有必要从货币权力理论和历史与现实证据两个层面，对反阴谋论者的虚无主义认知及其内在的逻辑缺陷进行彻底的解析。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遏制，中美货币对抗近乎公开化的情况下，这种解析不仅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也将有利于排除意识形态偏见，把货币权力和货币战争研究推向深入。

（三）主流货币权力理论研究的局限

在过去的20年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货币权力和货币对抗逐步受到主流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围绕美元权力、美元国际地位等问题，出版了一批重量级著作。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权力仍然是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与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相比，国际货币权力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善，还存在很多研究上的盲区，特别是存在基本概念混乱、货币权力界定失范以及核心机理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极大地限制了货币权力理论在学术上的传承和积累，另一方面也无法为各国货币和经济外交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不能不说是货币权力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遗憾。

1. 基本概念体系混乱

国际货币权力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学者开始以正式的理论术语定义货币权力的概念（Kirshner 1995；Lawton et al 2000；Andrews 2006a；Cohen 2000，

^① 王健：“高端财访王健：还原真实的美联储”，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3-12-13/113687313.html>。

2006)。或出于构建本人学术话语权的考虑，这些学者没有彼此协调建立统一规范的概念体系，而是各自命名了一套概念和术语体系，造成在权力基本概念上出现令人难以拆解的重叠和混乱。

例如，对于一国向他国施加的公开、直接的影响力或强制力，伯格斯特滕命名为“积极权力”（positive power），科恩直接称之为“影响力”，斯特兰奇叫做“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而安德鲁斯则命名为“工具性权力”（instrumental power）。与“积极权力”相对的“免受强制的权力”，伯格斯特滕叫做“消极权力”（negative power），科恩称为“自主”（autonomy），斯特兰奇和安德鲁斯则根本没有“消极权力”的概念。在斯特兰奇那里，与“联系性权力”相对的不是“免受强制的权力”，而是那种间接、非有意的权力（unintentional power），这种权力被她称为“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在安德鲁斯那里，与“工具性权力”相对的也是间接、非有意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他的“词典”里不是被称为“结构性权力”，而是匪夷所思地被叫做“联系性权力”——完全颠覆了斯特兰奇的概念体系。

更大的混乱来自所谓“结构性权力”概念。这一概念是科恩、斯特兰奇、柯什内尔等几代货币权力权威学者著作中都使用过的核心概念。斯特兰奇把“结构性权力”定义为“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①科恩也认为“结构性权力”是“通过重写游戏规则获利的能力”。^②表面来看，两者含义似乎没有显著的不同，都强调某种结构、规则对于他人的影响。然而，仔细比较两位学者在不同文献中对“结构性权力”概念的使用，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其实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虽然涉及对所谓结构——“关系框架”的构建，但她的结构性权力并非是指“结构”构建的能力，而是指来自“结构”的权力，特别是强调结构性权力以间接、非有意方式产生影响的特征。因此，在斯特兰奇那里，与“结构性权力”相对应的是那种公开、强制施加影响的权力——联系性权力。

^①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 24 - 25.

^② Benjamin J. Cohen, *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54,

科恩则不同，他将权力区分为“结构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认为“结构性权力”是“导致规则改变的那种影响力和能力”，而“程序性权力”是一种“在当前规则下获利的能力”。^①显然，科恩“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强调的是改变结构——“游戏规则”的能力和过程，而不是斯特兰奇那种由特定结构带来的间接、非有意的权力。就权力性质而言，科恩的“结构性权力”其实属于斯特兰奇“联系性权力”的一种。因为改变“结构”不仅需要公开运用权力，也必然是相关国家有意为之。

不幸的是，对于权力定义的混乱，在柯什内尔、安德鲁斯等新一代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他们自我命名概念体系的加入，货币权力研究从知识的积累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面临更大的障碍，甚至由于概念歧义连正常学术交流也到了几乎无法进行的程度，以至于一些当代货币权力学者不得不专门撰文对相关概念内涵加以界定和澄清。^②尽管如此，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构建、形成关于权力和货币权力的一套统一、公认、权威的概念体系，仍然是当前货币权力研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2. 货币权力界定失范

如果说关于权力概念混乱的影响，还只局限于一般理论的层面，对货币权力识别界定失范，则直接影响到货币权力理论大厦的主体。一些学者，例如本杰明·J·科恩，虽然认识到货币权力源于货币的国际功能和地位，但是由于基本概念的混乱以及对货币权力内涵理解的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货币权力的界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没有区分货币的权力和权利（利益）。主流学者没有清晰阐述货币权力和货币权利（利益）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这些利益并非独立于权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货币权力操作的结果。在一些文献中，货币权力被作为一种具体的国际货币收益（benefits），与诸如铸币税、宏观经济灵活性、威望等

^① 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利用其“结构性权力”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

^② Eric Helleiner, “Structur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No. 2005/10.